

(Peace of Westphalia)，另一個則是自然神論(Deism)。《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是自路德宗教改革以來持續了一百年之久的宗教衝突和宗教戰爭(尤其是三十年戰爭)的結果，但是該和約所確認和強調的「教隨國定」原則卻標誌着宗教專制局面的結束和宗教寬容精神的出現。正是在宗教寬容的基礎上，現代科學與民主的發展才成為可能。自然神論作為一種產生於英國的宗教信仰形式，對於十七、十八世紀西歐社會中的絕大多數知識精英都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不僅是那些著名的哲學家如英國的洛克、法國的伏爾泰、德國的萊辛等，而且連當時最傑出的自然科學家如牛頓、惠更斯等人也都是自然神論的信奉者。如果說十六世紀宗教改革的特點是以《聖經》的權威來取代羅馬教會的權威，那麼自然神論的特點則是以理性的權威來取代啟示的權威。

自然神論將自然理性確立為宗教信仰的基礎，把自然世界看作是一個充滿了和諧與智慧的作品，而把上帝看作一位具有無限理性能力的創造者或設計者。自然界的規律或秩序處處都體現着上帝匠心獨具的至高智慧，但是上帝一次性地創造了世界之後就不再干預世界的運行，任憑自然界按照萬有引力定律和牛頓力學三定律來運行。自然神論以一種非常機智的方式處理了宗教信仰與科學知識之間的關係，從而使二者之間的關係由相互對立轉變為彼此互補。在批判和揚棄自然神論的基礎上，康德的道德神學、施萊爾馬赫的感受神學相繼產生，它們重新確定了科學與宗教、知識與信仰的各自適用範圍，協調了二者之間的關係，深刻地影響了既有科學知識、又有宗教信仰的現代西方人對於自然世界和內心生活的基本態度。

追溯宗教改革運動以來西方宗教思想的這種變化，對於中國人理解現代西方文化的基本特點、反思中國文化的現代化轉型都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關於中國文化的現代化轉型問題，學術界歷來有各種不同的觀點。一是西方推動說，該派認為中國文化的現代化轉型是西方現代文化挑戰或衝擊的結果；二是新儒家觀點，該派認為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儒家思想尤其是在宋明理學中就已經內在地包含了一種現代化轉型的要求和能力；三是明清啟蒙論，該派認為自從明朝中葉以來，在中國文化中已經出現了一種向傳統的儒家

思想挑戰的啟蒙思潮，它構成了中國文化現代化轉型的關鍵因素。後兩種觀點固然都可以在歷史事實中找到支持自己理論的經驗根據，但是它們都必須首先面對如下兩個根本性的問題：一是宋明之際中國文化有無進行根本性變革的現實需要和歷史必然性？二是僅有精英知識分子的思想批判、而無大眾文化的價值變革能否導致文化的轉型？對於第一個問題，宋明之際的中國文化正處於輝煌的顛峰狀態，它根本不像宗教改革前夕的西方文化那樣迫切地需要變革。至於第二個問題，很顯然，少數知識精英的思想批判是不可能改變一種文化的基本特性的，只有像宗教改革這樣的普遍性的價值變革，才會使文化發生根本性的轉型。

毫無疑問，我們可以在宋明之際找到許多現代文化的萌芽形態，如商品經濟、民主思想和科學精神，但是這些處於萌芽狀態中的現代化因素，在西方現代文化對中國形成挑戰之前，卻遲遲不能生長成為一種強大的現實性力量。在宋明之際，雖然在少數知識分子——無論他們是儒家的還是反儒家的——中已經產生了一些新興的啟蒙思想，但是由於缺乏一種歷史契機來使這些啟蒙思想深入民心，因此這些思想只能囿限於學術的象牙塔中，並沒有對現實社會產生實質性的影響。換言之，宋明之際的中國只有精英階層的思想啟蒙，而無大眾文化的改革運動。正是由於這種只有精英階層思想啟蒙、而無大眾文化改革運動的現實狀況，使中國文化不可能真正地實現現代化轉型。只是在西方現代文化衝破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堅固藩籬之後，中國文化才啟動了現代化轉型的現實過程。

但是，在啟動意義上的西方文化推動說，並不意味着中國文化的現代化過程始終都必須在西方文化的陰影之下進行。無論是西方還是在東方，真正的啟蒙都是分兩次完成的，第一次往往是借助外來文化而破除自身孤陋寡聞之蒙昧，第二次則是獨立地運用自身的理性來破除一切權威崇拜和偶像崇拜之蒙昧。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宗教改革及其所引發的西方文化變革對於我們的啟發作用，主要在於對現代化轉型的邏輯起點和歷史起點的思考，而不在於對中西文化的現代化過程的簡單類比；它的重要意義是使我們看到了中西文化的差異性，而不是超越時空地去進行邯郸學步式的模仿。■

學術活動

會議

「當代宗教與實證性研究方法」

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民大學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美國舊金山利馬竇中西文化歷史研究所發起主辦的「當代宗教與實證性研究方法」國際學術研討會於2003年10月9至10日在北京大覺寺舉行。有來自中國大陸、香港及美國的二十幾位從

有幾位學者的報告對中國宗教的實證研究進行了一般性理論探討和反思。上海大學宗教與和平研究中心李向平教授的報告〈實證研究與當代中國宗教的若干問題〉指出了中國宗教研究經歷文化—倫理—結構範式的遞進，進而分析宗教的結構研究與實證研究的內在關聯，強調從文獻研究到與實證研究的結合具有學術演進和社會變遷雙重意義。

來自美國普渡大學的宗教社會學者楊鳳崗博士發表了〈中國宗教田野調查研究的幾點體會和反思〉，以開展「基督教在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文化功能」為課題的實證研究為背景，系統介紹了實證研究課題計劃的主要幾個階段，強調宗教社會學研究的實證性和客觀性。他同時檢討了在課題開展中對相關文獻掌握和評估的不足等問題。對於宗教田野調查的客觀性，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高師寧研究員則提出了「宗教實證的效度與信度」的問題，即調查所獲材料／信息的可靠性及從中所得結論的效應問題，並承認調查中材料收集的難度及各種調查方式的局限性問題。學者就研究者在調查中對宗教理解的中立性問題進行了討論。

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羅偉虹研究員強調從實際出發，研究中國宗教現狀的意義。她以研究所四訪江南某地「施相公廟」的經歷，介紹了幾種宗教田野調查方法。復旦大學的范麗珠教授與舊金山大學的James D. Whitchead 博士和Evelyn E. Whitehead 博士則以對深圳民間宗教信徒的經驗性研究為基礎，以跨文化與跨學科的研究方法理解個體在社會經濟變遷中對於「意義」的追尋及其和宗教信仰的關聯。

宗教實證研究的個案專題報告，除了羅偉虹和范麗珠的民間宗教研究外，其他學者的報告則集中在基督宗教上。高師寧的〈從北京看中國城市基督徒的信仰〉通過訪談基督徒和發放問卷，了解信仰在城市基督徒生活中的地位，並分析了二十多年來城市基督教的主要變化和影響城市基督徒信仰形成的因素。

關於中國農村基督教的狀況，來自雲南省社會科學院的韓軍學研究員和湖北大學的康志傑教授分別從少數民族與基督教、基督徒移民及其影響做了報告。韓軍學通過對雲南省瀘滄縣兩個拉祜族村寨的調查，考察了基督教在當地少數民族社區的基本情況包括基督教在社區發展中的影響，引發了學者們對少數民族的漢化與基督教傳入的關係、保護少數民族文化、以及漢化、基督教化、現代化三者之間關係的深入討論。康志傑的湖北磨盤山基督徒移民研究從一個獨特的視角，結合文獻資料和實地調查，考察一個由於政治原因為了信仰的純正而移民形成的「神權社區」的歷史和現狀，揭示了基督徒移民宗教信仰的延續，對世俗生活的影響，他們的生活變化及其與現代社會發展相適應的各種表現。



研討會上有兩位學者報告了有關天主教的實證研究。來自陝西西安神哲學院身兼學者和神職人員的楊小亭博士，在修院中進行的關於天主教會的調查，包含今日天主教的靈修、天主教組織狀況及發展、天主教禮儀、修院管理系統分析等課題。學者們就教內調查的可信度、中國教徒的人數、天主教徒對其他宗教的態度、社會變遷中信徒懺悔內容的變化等問題與楊博士進行了探討。另外，美國瑪利諾 (Maryknoll) 大學的宗教與文化研究中心的 Jean-Paul Wiest 博士會報了與浙江大學宗教文化研究所合作開展「中國的現代化、世俗化對天主教的挑戰」的課題調查情況。本課題意在探究中國天主教對市場經濟條件下提出的新問題的回應。調查發現，市場經濟對教會的影響是顯著且是多方面的，而信徒對現代社會和市場經濟則持着積極的態度。

在此同時，研討會上學者們的報告和討論也反映了這些實證研究的某些限制和有待改善的地方。第一，不少參與的學者都表達了在收集資料，和進行訪談調查時的困難和遇到的阻力，尤其是與教會和宗教管理部門的接觸。第二，政府管理宗教工作的一大原則是「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對他的理解與不同闡釋勢必影響着中國的宗教學研究，包括基督教的實證研究。學者們試圖把神學的發展與現代社會、社會進步、變化與需要聯繫起來。第三，學術界、政府、教會—神學院系統的溝通和對話問題，他們的不同背景、立場、開放度影響和妨礙展開實證研究中的合作。第四，開展宗教的實證研究需要系統的宗教社會學訓練，這一點在很多參與的學者、調查員中還顯得不足，調查研究方法的訓練關係到他們在訪談、調查中的「問題設計和提出」等重要環節而影響到調查的效果。第五，在研討會上有學者被問及「收集資料目的」的問題，這反映出有些學者在田野調查中「問題意識」的薄弱，也讓我們看到理論思考和實證研究結合的重要性，或者說，宗教學者在掌握實際資料時所應具備的神學反思的素質。這涉及到實證研究中的事實(信息、材料)收集和價值評估不可分離的兩方面。從這一點上看，就基督教而言，從事實證研究的基督教學者為了開展更有效的調查研究，他們需要廣泛的基督教理論基礎(如基督教與現代社會、基督教與道德、基督教與文化、基督教與政治、基督教與中國社會等領域

的知識)和相關實證研究動態的把握。從事實證研究的中國學者來自哲學、文學、歷史、社會學等各個領域，這些基本的理論背景對他們開展田野調查顯得尤其重要。

國內基督教研究生交流營

近年來港攻讀基督教專業之國內研究生漸多，他們在各自的專研範圍內學有所得，但礙於分屬不同大學及教研機構，難於互相砥礪，共同學習。有鑑於此，研究所分別舉辦了兩次學術生活交流營，旨在讓他們在道風山上享受一種激發學思、共同生活及追尋靈性的營舍生活。我們盼望在營中能開放心靈，在學理、人生及信仰上，共同切磋，凝聚成一個有深度的年青學術群體。應邀學生共有十餘位，分別來自香港中文大學、浸會大學、香港大學及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他們分別於基督教哲學、聖經研究、教會史、宗教哲學、中西文化交流等多個專業上彼此分享。在這兩次的交流營中，研究所分別邀請不同學者作專題報告，題目如下：

第一次交流營 (2003年10月25及26日)

- 楊慧林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主任及教授，該校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所長，2003年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訪問教授)
題目：神學的公共性問題
- 林鴻信教授(德國杜賓根大學神學博士，2003年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訪問教授)
題目：葛達瑪詮釋學在基督宗教「因信稱義」教義上的應用

第二次交流營 (2004年3月12—14日)

- 趙林教授(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2004年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訪問教授)
題目：基督教文化的現代轉型對中國文化變革的意義
- 張憲教授(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副系主任兼教授，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駐國內研究員)
題目：在基督宗教思想史視域中反思馬克思的宗教批判
- 溫偉耀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系副教授，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特邀教授)

題目：中國基督教教義學在全球地域化語境中的新取向——十個課題、兩個趨勢



尋真之旅——歷代基督教名著選讀講座系列

日期：2003年11月24日至12月15日(逢星期一晚，共四場)

時間：晚上七時半至九時半

地點：旺角弼街56號基督教大樓應用神學教育中心8樓會議室

主辦：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協辦單位：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11月24日 余達心博士：文化盛衰的判決
——奧古斯丁《上帝之城》的歷史觀照

12月1日 溫偉耀博士：神人之間的臨界點
——巴特《羅馬書釋義》之解讀

12月8日 鄭紹光博士：人的孤懸與他者的超越
——朋霍費爾《第一亞當與第二亞當》之解讀

12月15日 關啟文博士：上帝的在場與缺席
——漢斯·昆《上帝存在嗎?》之解讀



學術研究

訪問學者

于2003年10月至2004年2月，廿五位學者列

• 何光瀛教授於2003年12月至2004年2月，出任兩個

